

广义建筑学

吴良镛选集



WU LIANGYONG: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Wu Liangyong :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 吴良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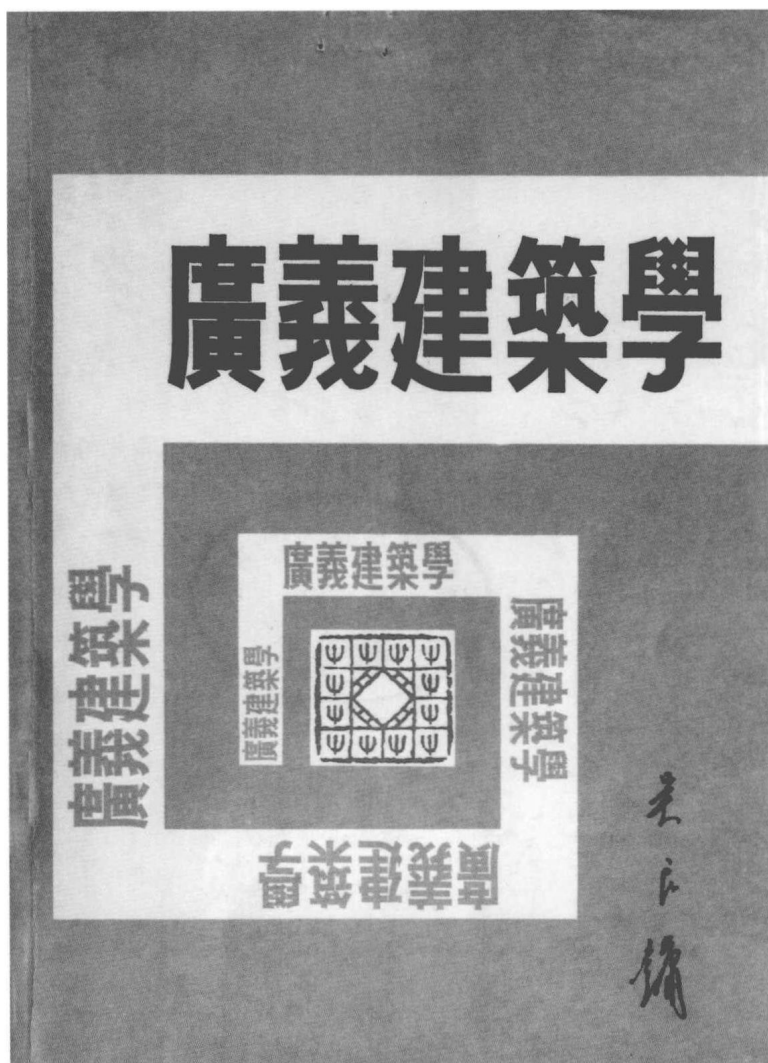
广义建筑学

Wu Liangyong :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 吴良镛 著

广义建筑学



清華大學出版社



《广义建筑学》第一版书影（1989年）

《广义建筑学》20年

“广义建筑学”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产物，在1987年8月1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推动的“建筑学的未来”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广义建筑学》1989年9月出版，至今正好是20年。

回顾这本书的思想酝酿过程，必须说明当时“拨乱反正”的政治形势和1984年“文革”后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次学部大会，我被遴选为学部委员（当时尚无院士的制度）。在这一大会上，吹响了振兴科学的伟大号角，更加重了我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建筑学面向改革必须走向科学；面向实际问题，寻找学术发展道路，探索建筑学的未来；建筑学必须向深度广度进军。

为何进军？如何走出困惑？一时心中无底，我从建国以来以至“文革”建设的正反经验，及1978—1981年我两度赴美国及欧洲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得，形成广义建筑学体系，有三点可以提出。

一是“聚居论”的突破：对建筑的概念，从房子走向聚居（settlement）

从开始学建筑专业以来，建筑学就是学盖房子，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接触到人类学，才有所悟。

这是受多种多样的启发而凝成的概念：

—1978年参观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内玛雅早期某一村落的启发。

—1983年参观大阪人类学博物馆早期农舍的模型，除房子外，有菜地、牲畜、池塘，因而回忆上世纪30年代末期在四川农村所见，竹林中三五农家成聚的有机秩序……

—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中国考古界对姜寨的发现。正像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上持聚居的概念对考古学的推进一样，抓住聚居，过去尝谓：“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吕氏春秋》），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旦领悟到人类从穴居野处到定居，是社会进化的一个重大进展，涉及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变化，这正是建筑学基本的立足论。

后来又重新领会希腊人道萨迪亚斯的学说。道氏的著作，我1980年在西德时就读到，但未太经心，后来将一系列的现象领悟起来，才觉它的意义。

这就是《广义建筑学》第一章的来历，从这个观念的突破开始，就解开了后续的思考。

二是方法论的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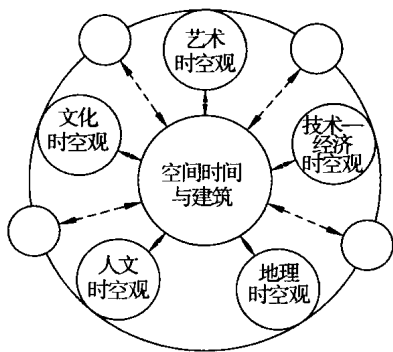
1948年受教于沙里宁训海“要重视思想方法”，多年来不仅未敢或忘，更不断有新的体会。1981年我受邀于香港大学城市研究中心讲学之余，得以广泛问学同好，浏览书林。包括对方法论学科的组合与融贯，略有收获，回来后直接有机会参加“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所提倡并主持的交叉学科的讨论会。除了发表对城市科学的论文外，想到一般将建筑笼统地称为工程与艺术、理工与人文、技术与艺术等等的综合，未及细加剖析：建筑究竟有哪些要素构成，又是如何综合构成的，每每不去细究，于是想到如能把一些基本要素加以探究或有助于加深对建筑的认识。于是我先剖析聚居，渐次以地区、文化、科技、艺术，诸论为基础，辅以政治、教育、业务、方法、诸论则有助于推进对建筑的基本认识。

从方法论看，上述对建筑学科为若干要素构成的剖析，是基于还原论的方法，但不可忽略的是还必须整体地看待建筑。

三是对建筑学综合的整体的思考——广义建筑学的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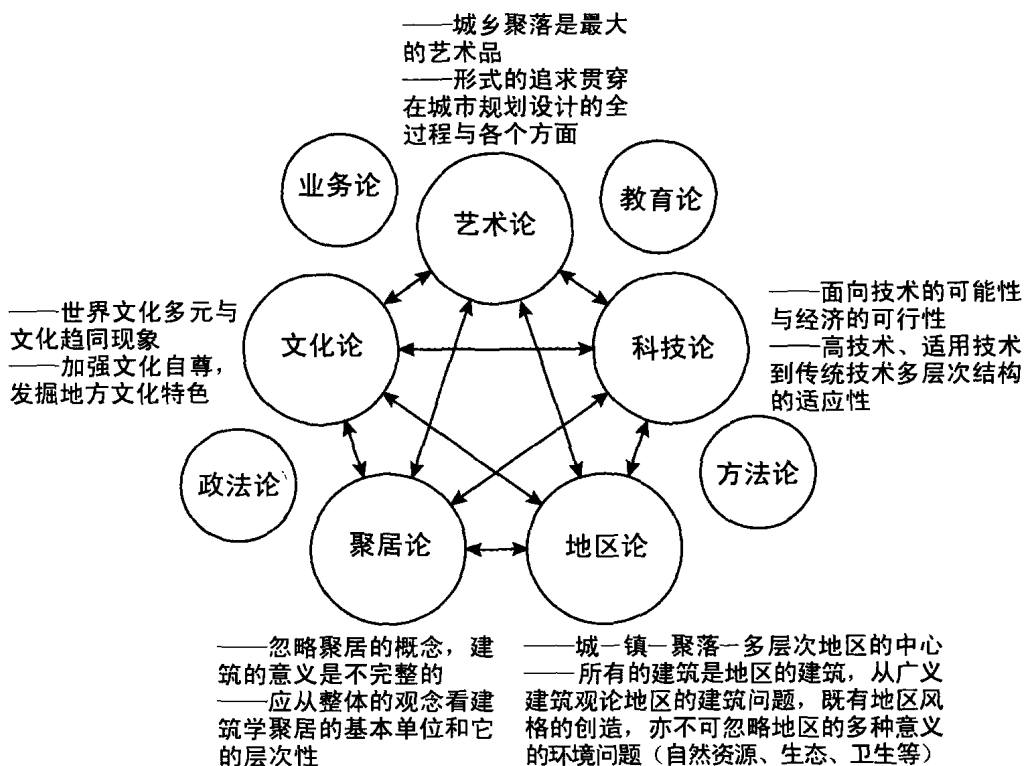
整体观念、普遍联系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要点，上述诸要素宜加以综合的、融贯的表达。宇宙万物与人的关系可以以“时间—空间—人间”来看待。人们在变化万端的时空中生活着，形成种种不同的时空观。我试从人文、自然、地理、文化艺术等方面对下列种种的时空观展开讨论：

- 人文时空观
- 地理时空观
- 文化时空观
- 技术—经济时空观
- 艺术时空观
-



继之，扼要加以综合论述而构成广义建筑学的框架。通篇的出发点和回归点：“美好宜人的环境创造”，途径是多学科综合融贯研究。

《广义建筑学》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评，包括前辈学者、多方面专家在座谈会上和各个文章上，有不少赞赏之辞，这无须多说。但有一点却可以说各家评论是一致的，即“中国建设改革实践，热切需要理论”，中国建



筑需要“开创融贯中西的中国自己的建筑学派”等等^①。这也正是我的初衷，说明我的工作方向是对的，正是建筑界人士所期望做的，这是对自己工作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自己的体会：一个专业——建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展拓。文艺复兴时代阿尔伯蒂(B.Alberti)的《论建筑》，对比西方建筑学的始祖——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无论内容、形式，深度广度上都是一次展拓。近代建筑比起文艺复兴时期当然又有了极大的展拓，当然又提出亟待解决的种种难题。对中国当代的建筑更是要自觉地结合国情，吸收时代先进的思想与技术，把建筑学推向新的高度、广度与深度。

下一步怎么走？我曾请教张维教授，他很欣赏这本小书，认为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框架，他建议参考某些德国学者常用的方法，把十论当作十本书来写，一一加以深化，必然更有价值，并对我多有鼓励。

这样做当然是一个大工程，但当时已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建设更突飞猛进，问题更层出不穷。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面临新的研究课题太多，促使我们在“小跑步”中前进，不得已只能把“广义建筑学”的深化研究暂时放在一边。当时我曾一度想增写一章经济论，已经着手思考，时作时拙，终未成篇。

① 见《住房·环境·城乡建设》

但无论如何，在治学的道路上，这本书的撰写为自己打下了科学的基础，聚居论的突破，方法论的领悟，整体思维的形成，都得益于这一时期的思考。此后在1989年，在作为国际建协副主席、第四区（亚澳地区）主席主持召开“转变中的亚洲城市与建筑”为主题的大会上，我的主旨报告“探索面向地区实际的建筑理论——广义建筑学”，以及1999年国际建协在北京召开的第20次会上我所作的主旨报告“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以及“北京宪章”等，包括后来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等等的发展，可以认为是以此为基础的继续探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建筑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义建筑学》中已不止一次提到“优美的居住环境将更有益于人民身心的健康，新道德风尚的树立”（《广义建筑学》223页），“回归到宜人的环境创造上来”（《广义建筑学》221页）等等。1990年6月27日为纪念世界建筑节（每年的7月1日），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以“人居环境”为主题的座谈会，我作了专题发言：“创造我国人居环境的新景象”，认为人居环境问题是当前共同的问题，“广义建筑学”就是着眼于中国新景象的一种尝试。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环境建设没有明确的概念和专有的名词，梁思成先生一直不满“建筑”一词，这是20世纪早期沿用日本对architecture的译法。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将建筑系改称“营建系”就想沿用中国传统名词，因为它有比较宽阔的内容，但1952年院系调整，为了求全国统一，又被改回来。

由于建筑的观点单一面窄，建国初期，在具体工作中每每并无全面正确的观念和定位，例如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在讨论总体规划的修编中，北京市拟向中央申请拨住房（经费）5亿、道路等设施（经费）2亿。我在会上就根据联合国“确定住宅建设与环境发展的目标与标准的方法”的观念提出市政设施分三类：第一类，工程设施（如供水等）；第二类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等）；第三类，商业设施等（包括商店等），这类可以单独另列。第一类投资相当于住房的25%~50%，加上第二类投资应相当于住宅的50%~100%。我国一般住房问题不单住房本身，公共基础设施并不配套，其关键在于缺少居住环境的整体的观念^①。如果按照联合国提供的这一比例表，则北京市应向中央申请道路等基础设施投资2.5亿~5亿。这一个小的例子，不仅说明北京市向中央提出的申请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们对建设体系观念的模糊。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高峰会议”通过“21世纪行动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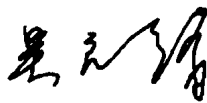
① 见《住房·环境·城乡建设》

程”，其中有专门一项“人类住区环境建设”。看到这些材料，我们受到极大的启发。多少年来我们的建筑、建筑业的观念总体上并不十分明确，而这些材料提供了较为基本且较完整的诠释。1993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术报告会上，我与周干峙、林志群作了“我国建筑事业的今天和明天——人居环境学的展望”的学术报告，即以这一新的学术观念、学术系统，建立、发展以环境和人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为基本的研究，正式提出从建筑到城镇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的学科。随后得到相关方面的重视，包括媒体的报道、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的成立等等。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个人的研究多侧重在这方面，包括“人居环境导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初步提出等，这里无须赘述。

回顾这20年来工作，或者追溯到建国以来取名“营建系”的初衷，就原建筑学的发展，不适应祖国轰轰烈烈的大建设的形势。建筑学“必须向深度与广度进军”，“广义建筑学”的工作就是从单一学科领域作必要的尽可能的拓展，而“人居环境科学”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将过去建筑的范围进而展拓为人居环境，将建筑——城市——园林——技术为核心专业，化解为一学科群，从更宽阔的学术空间致力于人居环境的开拓，寻求宜人环境的创造；面向人类的更大的科学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等。这就是我从《广义建筑学》出版20年来的探索心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永不完结，我们的探索也永不完结。

《广义建筑学》1989年只印了3500本，因为我一直想扩充改写，没有再版。但至少在高等学校中复印流传较广，被引用较多。台湾方面在“《空间》杂志有详细的提纲介绍，后又出繁体文本。罗马大学在筹划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的刊行，因此我索性打消改写的念头。这次修订仅改正了一些错字，加写了这篇序言，作一些说明。并将《探索面向地区实际的建筑理论——广义建筑学》^①一文附录于后。

20年来，祖国变化很大、成就很大，我在书中提到希望能够避免的事，往往不幸而言中。而20年前的旧作，其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请学者予以指教。



2009年10月14日

① 中文发表于建筑学报1990年第二期。英文发表于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15, No.3, P.309, 1991。台湾地区繁体译作《区域现实论》，发表于台湾《空间》杂志，译者为成功大学兼任教授王泽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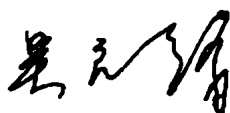
《广义建筑学》台北版书影（1991年）

《广义建筑学》台北繁体字版序

《广义建筑学》自1989年出版一年多来，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注视。原书所印不多，书坊现已售罄。蒙建筑界同仁之赞助，现在“台北版”繁体文本已排版完毕，即将付梓，实不胜荣幸！海峡对岸，有我的学长、旧友、新交和尚未结识的学者，敬以至诚，聆听教益。

一年多来，作者本人基于广义建筑观，继续从事理论的探索，一些论文陆续发表。同时，在实践方面，原书196页所述及的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的第一期试点工程，已于1990年下半年完工，第二期工程亦已陆续开工。这一工作的进展，从方法论来说，得益于本书第九章已论及的“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我仍然在继续探索，将随时总结心得以此告慰友人。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书不尽意，愿我们在共同的事业中交流切磋！



1991年3月25日

《广义建筑学》英、意译文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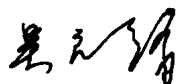
这是记录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探索中国建筑理论的一本著作，自1989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整整20年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纠正60年代到70年代错误的政治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在寻找出路，思想上风起云涌。在此时代背景下，该书的本意是向西方寻求经验教训，向传统寻求历史经验，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例如，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珍视，对历史遗产的爱护，对住房建设的保证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戒之再三，近20年来不少当时担心的事还是不幸被言中了。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论建筑》，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特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建筑十书》，以至现代建筑理论都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学必要拓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当今多学科并行发展的时代，我们更要自觉地以“融贯的综合研究”，拓宽本专业的业务领域，因此，我称之为“广义建筑学”（Integrated Architecture）。

本书出版后，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科学的哲学与方法论基础是一致的，都是以聚居环境（human settlements）为出发点，对传统学科自身的展拓。人居环境科学研究更超越了建筑学科，谋求人居环境各学科领域的交叉与融合。90年代以来，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科学的观念在中国日益发展，在国际建筑界也受到重视，例如1999年国际建协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本人执笔的《北京宪章》，即提倡“走向广义建筑学”，“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罗马建筑学院院长巴尔贝拉教授曾带一个团队研究北京的香山和颐和园地区的规划、建筑与园林，通过21天的集中工作，形成了很有新意的成果，我对此颇为欣赏和敬佩，我们也因此顿成知交。特别感谢他将我的这本书介绍到意大利，并借此希望得到西方读者的批评和意见。



2009年3月1日



Preface for the Italian and English Editions

This book recorded my explorations into the theory of architecture in China in the 1980s. A whole 20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in 1989.

In the 1980s, China saw a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thinking from the mistake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an initiation of the opening-up and reform policies. At that time, every walk of life was searching for a new way of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the continuous rising of different thoughts. It is under that background that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was written. It intended to look to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nd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for wisdom and insight, and sought to resolve the pressing issues of the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The issues that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book included, amongst others, the care for land resources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 heritage, and appropriate housing for all. Personally, it is deeply regrettable to see that many of the concerns we spoke about over and over again 20 years ago have actually materialized as facts today.

De Architectura by Marcus Vitruvius Pollio of Ancient Rome, De Re Aedificatoria by Leon Battista Alberti of the early Renaiss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ll indicated that architecture must reach out as it develops. This is in the nature of its development. In our times when numerous disciplines are growing in parallel, it become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reach out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cope of architecture via a conscious effort of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is what I call a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is book in 1989, I turned to a research framework that is based on an outlook of 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SHS). The SHS framework further broadens the proposal of the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In fact, many issues had already been discussed from an emerging SHS perspective in the 1989 book.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the SHS framework remains the same as the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and it now encourages closer linkage and integration of related disciplines. Since the 1990s, the concepts set forth by the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and the SHS have gained momentum in China. It has increasingly drawn attention worldwide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e. For instance, the Beijing Charter from the 20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 (UIA) advo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ding of better human sett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common goal and ideal of the humankind”.

Several years ago, I met Professor Lucio Barbera, 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t 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 when he led a team to study the scenic areas around the Fragrant Hill and the Summer Palace in Northwest Beijing.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joint studio of 21 days produced works that feel like a breath of fresh air, which I appreciate and admire. We became good friends then. I especially acknowledge his kind efforts to see the English and Italian editions through to publication. I look forward to the feedbacks of these editions.

WU Liangyong

1 March 2009

